

给
阅读
留
一份
纪念

魏邦良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给阅读留一份纪念:一位学人的读与思 / 魏邦良著. —银川:
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8.3

ISBN 978-7-227-03737-8

I. 给… II. 魏… III. 读书方法 IV. 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4699 号

给阅读留一份纪念

——一位学人的读与思

魏邦良 著

图书策划 戎爱军

责任编辑 戎爱军 杨敏媛

装帧设计 赵倩
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杨宏峰

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施尔福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8.5

字数 200 千

版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3737-8/G·532

定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阅读：生命的遇合（自序）

2006年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我出了本书——《隐痛与暗疾：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》。书出版后，我收到一位来自北京的热心读者的来信，信中写道：

“读罢《隐痛与暗疾》，掩卷良久，喜！想不到今日年轻学者有如此功力，竟然以如此犀锋，刺向现代文人之空门。读来有如春风吹过，令死灰之心又生发出一丝希望。呵！……君之勇气、锐气旷世难得，令人叹服。敬！不知从何处能多看到些您的作品，请示博址、书名、文篇……”

这样的夸奖当然让我耳热心跳，也令我愧不敢当。感谢这位远方的热心读者，您字里行间显露出的那份鼓励令我感动，您字里行间蕴涵着的那份期待让我奋进！您的信对我是最好的奖励、最强的激励和最大的鞭策。

作为作者，我始终认为，要想写出好作品，一要走路，二要读书。在我看来，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不仅可以广见闻，长知识，更可以锻炼意志，锤炼灵魂。

孟子云：吾善养吾浩然之气。在我看来，“走路”和“读书”正是“养吾浩然之气”的两条必由之路。不过，由于一己的习惯，我更愿意通过“读书”的方式来养气。我想，只要用心去品

味，每次阅读，都能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可贵的感悟。手头有一本钱理群先生写的《我的精神自传》，我正读到如下这段文字：

“我读鲁迅的书从出发点上就不是把它当作古董，或者作纯学术的考究，而是带着人生种种困惑、苦恼、渴求，到他那里去寻求心灵的启示，学习如何做人，在学习中慢慢知道其人其事，积累的多了，因为种种机缘，就倾诉而为书。我研究他，不是在学院中把他当作研究对象，而是把他当作引导者，首先学会怎样做人，然后有体会，写成书。”

钱先生的这番话给我如下的启示：读任何严肃的书，都应该“带着人生种种困惑、苦恼、渴求”，然后，在这些书中“去寻求心灵的启示，学习如何做人”。至于捉笔成文，那是因为“在学习中慢慢知道其人其事，积累的多了，因为种种机缘，就倾诉而为书”。事实上，这本《给阅读留一份纪念》，就是笔者阅读后的“倾诉”。

坚持锻炼，可以拥有形体的美；坚持阅读，可以拥有灵魂的美。书，不能成为摆设，也不应沦为工具。我认为，书，应该成为喂养我们灵魂的粮食。读书，不是为了消遣，而是为了增加我们生命的厚度，提升我们做人的品质。

书之于我们，不仅是精神上的契合，更是一种生命的遇合。

目录

像人一样活着

——读张中行想到胡风 / 001

乔冠华与胡风：同饮一杯绝望的苦酒 / 015

胡适的“天性”与“兴趣”

——读《胡适口述自传》有感 / 023

东奔西走，何补苍生！

——胡适作为“诤臣”“诤友”的悲剧 / 031

胡适与吴国桢谁在说谎？ / 054

萧乾的“理解”与“误解”

——《萧乾回忆录》读后 / 071

“鸽子恋家”的背后

——萧乾北上的真正原因 / 087

萧乾是如何沦为右派的？ / 101

我若死，天地将为之变色

——梁漱溟“狂妄”话语的背后 / 113

天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生命？

——余秋雨《借我一生》读后 / 119

钱锺书是怎样住进“部长楼”的？ / 136

胡乔木的另一面

——给杨绛先生补白 / 142

目录

一位“名门人士”和“文化部长”

——王蒙《半生多事》读后 / 149

耐人寻味的“酷评”

——王蒙《大块文章》读后 / 157

老调重弹为哪般？

——韩石山《少不读鲁迅，老不读胡适》读后 / 169

朱家骅：在鲁迅与顾颉刚的夹缝中 / 191

唐德刚与金庸：在相同的书里“掘”出不同的宝

——对《资治通鉴》的不同读法 / 198

你知道的太多了！ / 206

“祖国”与“国家”：两个不该混淆而又常被混淆的概念 / 215

“抱成一团”与“一盘散沙”

——从索尔仁尼琴的感慨说起 / 220

颓废文人：给嫖一个理由 / 225

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/ 234

甩掉了思想的声音

——读《知堂札记》有感 / 240

像人一样活着

——读张中行想到胡风

自《负暄琐话》问世以后，年过古稀的张中行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。越来越多的人被他那古色古香、风味独具的文字所吸引，笔者也不例外，他的那本砖头一般厚的《流年碎影》，笔者翻了不下三遍。可随着阅读的深入，笔者对张中行其文依旧爱不释手，对张中行其人却渐渐不以为然。我对张中行其人的不以为然始自于对《流年碎影》中《天降下民》一章的细读。

在这一章中，张中行讲述了他的一位男性朋友的故事。“姓宋，名君颖，京北昌平县人。他值得提出来说，是因为天赋方面，我觉得罕见，很怪。最突出的是固执加迂阔。其下有种种不调和。……总之是几乎一生，心都是飘在天上，头则不只在地上，而且不断往硬壁上碰。”“……他的固执和迂阔来于天，绝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。空口无凭，有许多可资谈助的事为证，不好过多地占篇幅，依祖传以十为满之例，由轻到重举十件。”张中行列举了十件事例来证明他的这位朋友的“固执加迂阔”，限于篇幅，笔者只能“去粗取精”选取三件，照抄如下：

“（2）已经是八十年代，他年过耳顺，一天傍晚，



到燕园我的住处，一进门就郑重声明：‘今天是给外甥女送复习材料，不能在这里吃晚饭。’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‘怕人家说，我是借送材料来找饭吃。’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，教训他：‘我不知道你还要糊涂到什么程度！你哪回来不吃饭？’他说：‘不管您怎么骂我，反正我不能吃饭，因为是送材料。’就这样，我们吃，他在旁边坐着，人人觉得不通人情，他却自以为是。”

“（4）也是那个时期吧，郭沫若写《李白和杜甫》，说李白高，杜甫低。他不能忍，写万言书寄给郭。当然没有回音，他再写。我批评他过于迂阔，他说他学诗，杜是他的恩师，恩师被贬低，他一定要斗争到底。”

“（8）还告过一次状。记得是1956年，职工普遍评级，他一贯自视甚高，跟我说，如果不评他为某一级，他就提出抗议。我以身教之，说任何事物的定价，严格讲，权是在买主手里。所以我是即使降到最低，也必欣然接受。他不言语，表示心里不以为然。不久，评的结果公布，他没如愿，大怒，到教育局告了校长一状。”^①

先看（2）例，送材料就是送材料，吃饭就是吃饭，宋君颖这样做，表明他是坚守原则的人，哪怕是对这样一件小事也十分认真，这既不“可笑”，更不“可气”。而张中行不仅自己不以为然，且想当然地推测“人人觉得不通人情”，如此不“识”好歹，真乃匪夷所思。

再看（4）例，在郭沫若如日中天之际，宋君颖以一个无名

^① 张中行：《流年碎影》[M]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7：450



之辈，敢于和其“斗争到底”，仅凭这份勇气也足以让人心生敬意。当然，从结果来看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宋君颖的做法无异于以卵击石，“过于迂阔”，但从过程来看，他以万言书向权威挑战的行为却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正气歌，而张中行以一个怯儒者的身份有什么资格对此冷嘲热讽。作为熟读孔孟的当代大儒，张中行应该知道，宋君颖的做法难道不正是儒家所提倡的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吗？

至于（8）例，在我看来，只能说明张中行的可悲，不能证明宋君颖的可笑。在我看来，对于任何事，如果公平合理，理应“欣然接受”；如果不公平不合理，当然要“提出抗议”，而张中行却认为“即使降到最低，也必欣然接受”，他的不分青红皂白的“欣然接受”，恐怕很难让别人接受。说来说去，张中行宣扬的不过是逆来顺受的陈腐观念。当然，张中行选择逆来顺受，这是他的自由，而宋君颖选择“提出抗议”，别人（包括张中行）也无权说三道四。如果张中行愿意逆来顺受，放弃抗争，别人就一定要步他后尘吗？不步他后尘就是“固执与迂阔”，这是什么逻辑！

经过举例证明，张中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：宋君颖虽“本质很厚”，但因为天生的“固执加迂阔”，最终“一生不能清朗”。笔者承认，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，敢于向大权在握的权威挑战，喜欢向耀武扬威的“领导”抗议的宋君颖，定然会屡撞南墙，“一生不能清朗”。但导致这一结局的罪魁祸首，不是什么“固执加迂阔”，而是那个人妖颠倒的荒唐社会。而张中行对那个荒唐的扼杀个性践踏人权的社會不置一词，不放一矢，却把矛头指向宋君颖所谓的“固执加迂阔”，如果这不是欺软怕硬的话，至少也是本末倒置。



说到“固执”，说到“迂阔”，我们无法不想到胡风。和胡风相比，宋君颖的“固执加迂阔”，何止是小巫见大巫，简直就不值一提。宋君颖敢给郭沫若写万言书，胡风则敢给毛泽东写三十万言书。按张中行的推论，宋君颖因为“固执加迂阔”，“一生不能清朗”，那么，胡风则因为“固执加迂阔”，失去了宝贵的人身自由，被关押了整整24个酷暑寒冬。

1965年4月，在被关押了长达十年后，胡风在狱中第一次和阔别十年的妻子梅志见面。妻子劝他说：“你可以检查一下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，这大约是主要的问题。”胡风听了差点发火，但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，而是长叹一声：“关于这方面，你最好别过问。这个死结不是我所能解开的！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。就算是文艺思想有错，那也是认识问题，不是政治问题。”^①

后来，胡风看到女儿晓风给他的一封信也大为不满，因为晓风在信上要他向溥仪学习，争取特赦。为此，胡风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妻子梅志大发脾气：“什么话，要我向溥仪学习！要我向这专靠剥削人民过着腐朽没落生活的封建皇帝学习！政府帮助他改造成新人，是党和人民的宽大。我能和他一样全部否定自己？我学习马列主义，一心跟党走，一心想为党做点有用的工作，这也错了吗？我何尝不知道大帽子底下过关，但那是对党对人民的不负责任，对自己的不负责任，我没有做过的事绝不能承认，做了的是否全错了也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。我还得用大量时间学习马列主义，深入实践，才能得出结论。这不是关在独身牢房所能办到的，这能怪我吗？……”^②

① 梅志．胡风传 [M]．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1998：654

② 梅志．胡风传 [M]．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1998：655



明知道低头认“罪”，给自己扣顶莫须有的大帽子，就可以过关，甚至可以出狱，但胡风就是死不认错，“顽抗”到底，即使面对女儿和妻子的轮番劝说，他也不为所动。在张中行眼中，胡风此举可谓“固执加迂阔”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，但胡风这样做，却表明了他对真理的执著追求：“我学习马列主义，一心跟党走，一心想为党做点有用的工作，这也错了吗？”；对做人准则的顽强坚守：“我没有做过的事绝不能承认。”

1966年，周扬被打成所谓的“黑帮”。我们知道，胡风和周扬可以说是一对“老冤家”，20世纪30年代，他们俩就发生过激烈的论战，解放初期，周扬大权在握，正是他发表于1954年12月10日《人民日报》头版的那篇《我们必须战斗》，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。事实上，胡风的所谓“黑材料”，有很多就是经周扬之手“整”出来的。当时的公安厅负责同志当然知道胡风和周扬之间的“过节”，就找胡风谈话，要他写材料揭发周扬。胡风却支支吾吾，不肯答应。他对妻子梅志吐露了自己的看法：“不管报上说得怎样吓死人，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，决不违心地说别人的坏话或好话，是怎样就怎样说。今天，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，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。文艺理论，尤其是整个文艺界的问题，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，必须做过细的工作，展开自由、广泛的讨论，而不是像这样靠大批判能得到结论的。像这样批周扬他们，是言过其实的，难以服人。”^①

为了应付差事，胡风就写了一首《水调歌头》权当所谓的“思想汇报”，梅志看了觉得不妥，就提醒他：“用它当一个月的思想汇报，人家会骂你老顽固，故意搪塞。你不仅要有应有的歌

^① 梅志：胡风传[M]。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1998：690



颂，更主要的是要你揭发已经揪出来的‘黑帮’，骂上几句都可以，这才算是有进步。”

胡风却态度坚决地回答：“这个我办不到。他们可以昧着良心将我判刑，我可不能给他们胡乱编造。我被判的罪名之一是‘企图篡夺文艺领导权’、‘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’。当时，我甚至都不想问，我有这么大能耐吗？你知道，我是双手将意见书送呈给中央的。……后来，审判我说我交的是为中央定制的炸弹。这不更可笑了吗？我再愚笨无知，也不会蠢到这地步吧。‘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’，所以，对周扬他们一定还有许多我们想不到的罪名。我和他是30年代的同事，后又成为反对者，所以一再想说服我，当个积极分子，赶潮流。这我办不到，不要说我知之甚少，就是知道的这点，也不能上升为揭发材料。我绝不向有些人学习，这是丧失党性，损人利己的事，我不干！”^①

本来，写材料揭发周扬，对胡风来说可谓一石三鸟的美差——既可公报私仇，也可讨好上级，还能立功减刑。可胡风为了做到问心无愧，为了坚守自己“损人利己的事，我不干”的做人原则，宁可得罪上级，罪加一等，也绝不“胡乱编造”。对周扬不仅没落井下石，反而为他鸣不平。如此以德报怨，如此坚守原则，足以让那些虚伪、势利之辈为之汗颜为之羞愧为之反省。胡风的人格何其伟岸，其品德又何其高洁，真可谓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，虽身不能之，但至少可以心向往之，如果按张中行所奉行的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的处世原则，说胡风此举是“固执与迂阔”，是自讨苦吃，岂不是佛头着粪吗！

张中行也曾在于校接受过“改造”，但他的“改造”生活可

^① 梅志·胡风传[M]·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1998：692



谓风平浪静，有惊无险，究其原因，还是让他自己来说吧：“……如我，由士下降为臭老九，进过无耻训练班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，到干校接受改造，曾不止一次被批斗，就显示了能适应的优越性，是批斗之时，可以‘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’，批斗之后，吃王福海师傅做的红烧鱼，甚至比平时更加香甜。”^① 张中行之所以能适应干校生活，一方面是因为他是“无耻训练班”的高才生，另一方面，是因为他有堪称“童子功”的“对应之道”：“排之下为班，我分入三班，班长像是有虚名而无实权，吾从众，也不能不势利眼，所以就不记得是哪一位了。编制定，以后的生活是看排长的脸色，今天让你挑水，就去挑水，明天让你淘粪，就去淘粪。还有额外的，比如正在床上梦见周公，会叫你一个人起来，去卸车，车上常常是石灰。费力的劳动多种，当然不能选择，令下，对应之道只能是由小学一位业师王先生那里学来的，‘我绝对服从，看你把我怎么样！’但这位姜君还是能够来点怎么样，是常常，袖手旁观，怒目而视，有时，兼发言：‘你为什么不好好干！’我当然不敢反驳，但要对应，之道只能是低头。还有较长时间的低头，是受命站在‘战友’的中间，接受批斗。”^②

读到这里，我不禁为胡风扼腕叹息，如果胡风和张中行一样“进过无耻训练班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”，如果胡风能遵循张中行信奉的对应之道：“我绝对服从，看你把我怎么样！”那么，胡风的后半生说不定会改写，那顶吓人的“反革命分子”的大帽子或许就不会扣在他头上了。然而对张中行的对应之道，胡风肯定是不屑一顾。即使身陷囹圄，即使身为犯人，如果事关真理和人

① 张中行：《流年碎影》[M]。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7：515

② 张中行：《流年碎影》[M]。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7：535



格，胡风仍然会以死相争。

面对干校的一个排长，张中行要么“绝对服从”，要么低头认“错”；而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65年11月26日当庭判决胡风有期徒刑14年后，胡风则写下“心安理不得”以示不服和抗议。

胡风在四川“监外执行”时，有一天当地的一位处长来“教育”胡风：“你老张——胡风原名张光人（笔者注），到这里已快三个月了，进步可很慢啊！你应该积极争取进步，争取减刑啊！”他的命令口气让胡风很反感，胡风就反问道：“你说我应该怎样争取？”那位处长说：“认罪服法嘛，我们坦白从宽、立功受奖的政策，你是知道的嘛！”胡风顶撞道：“我认识不到自己的罪，我也没什么可以立功的。”处长听了大为光火，说：“你，你，你可真顽固啊，不听管教。”胡风也火了，说：“我怎么顽固了？我不是老老实实地在服法嘛！”那位处长恼羞成怒，破口大骂道：“你他妈的！老老实实？你还心安理不得呢！”胡风闻言，呼地一下站起，双手气得直打颤，他指着那位处长说：“怎么，你骂人？我顽固，你可以枪毙我，怎么可以骂人！”那位处长被胡风的气势所震慑，灰溜溜地跑了。^①

在胡风，事关人格、尊严，必须以死抗争，决不退缩；在张中行，为了苟全性命，则可以放弃尊严，斯文扫地。两人的区别在此，由此两人境界之高下也立现。

身为囚犯，被“长官”赏一句国骂，在胡风是忍无可忍的羞辱，在张中行，恐怕就不算一回事了。看完张中行下面这段话，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：“且夫新时代的新花样有罚扫街之类，

^① 梅志·胡风传[M]．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1998：683



人皆视为耻辱，己独不然，亦有说乎？曰有，而且可以凑两项。一项是天塌砸众人，早晨，出动一群，为首的并且是原来的党委书记，微末如我，又何耻之有哉。还有一项，是由多次运动的锻炼来，还可以分为两小项：一小是确信，想活，就要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；另一小是受辱，如喷气式，惯了，依照吾乡某小学生‘惯了一样’的人生感悟，也就真可以不当一回事。”^①

是啊，如果能做到“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”，如果不管遭到怎样的羞辱都能做到“惯了一样”，那么，即使身逢乱世也可以逢凶化吉，即使风吹雨打也照样能闲庭信步了。可是，能“修炼”成如此麻木不仁的金刚不坏之身，又谈何容易！难怪季羨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张中行是“高人，至人，逸人，超人”。

为了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，不得不忍辱含垢，对此，我们不必苛求。但如果把这种麻木不仁当作一种“处世奇术”来宣扬，并且指责那些不甘受辱、勇于抗争的人为“固执加迂阔”，恐怕就大谬特谬了。

在张中行看来，“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”“惯了一样”是一种乱世中求生存的智慧，是“聪明人”的对应之道。但在知名学者季羨林看来，麻痹道德意识，泯灭抗争意识，所谓“惯了一样”，则是“自暴自弃”，甚至“堕落”。张中行在干校的“劳动改造”，季羨林在“牛棚”中也“品尝”到了。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，季羨林的看法与张中行相差甚远：“自己一下子变成了‘鬼’。最初还极不舒服，颇想有所反抗。但是久而久之，自己已习以为常。人鬼界限，好坏界限，善恶界限，美丑界限，

^① 张中行：《流年碎影》[M]。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7：509



自己逐渐模糊起来。用一句最恰当的成语，就是‘破罐子破摔’。”^①在“牛棚”里，季羨林也学会了说谎，学会了“坚决服从”，做了一些连自己都不能原谅的丑事：“……上面说的这一些极其猥琐的事情，如果我不说，决不会有人想到。但是，这些都是事实，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。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，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不寒而栗。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，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。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，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。”^②

对于曾经的麻木不仁，对于无奈的“惯了一样”，对于丧失尊严的“劳动改造”，一个是“不寒而栗”，一个是“不当一回事”；一个是带血的反思，悲愤中含说不尽的沉痛，一个是轻松的调侃，笑谈里有掩不住的自得。两种看法，两种态度，孰是孰非，明眼人一望便知。

其实，无论是“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”，还是“惯了一样”，都不是张中行的发明创造，他只不过是“发扬光大”了中国传统的“滑头哲学”罢了：“当中国作家、中国文人为自己的聪明而沾沾自喜时，近代人文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以及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，便显得十分可笑，而那种超越世俗的精神需求，则更成为匪夷所思的了。中国的儒家也好，道家也好，某种意义上，都只能说是一种滑头哲学，都往往忽略人的意志和品格。当面临严酷的现实时，当遇到强大的挑战时，不屈服，不妥协，高扬自身的意志去与现实抗争，在对现实的超越中实现自我的精神

① 季羨林. 牛棚杂忆 [M]. 北京: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 1998: 177

② 季羨林. 牛棚杂忆 [M]. 北京: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 1998: 178

